

客家研究文丛

悲壮交响曲

秦柯 著

邓演达评传



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客 家 研 究 文 丛

悲壮交响曲 ——邓演达评传

秦 柯 著



BEI ZHUANG JIAOXIANGQU

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



0000146806

4481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悲壮交响曲——邓演达评传/秦柯著. —广州: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, 2003.7

(客家研究文丛)

ISBN 7-5623-1915-4

I. 悲… II. 秦… III. 邓演达 (1895~1931) - 评传

IV. 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5196 号

总发行: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

(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, 邮编 510640)

发行部电话: 020-87113487 87111048 (传真)

E-mail: scut202@scut.edu.cn

<http://www2.scut.edu.cn/press>

责任编辑: 周莉华 黄玲

印刷者: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2.25 插页: 2 字数: 310 千

版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000 册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邓演达

客家研究文丛编审委员会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顾 问	杨应彬	杨资元	张汉青
	张 磊	何中华	郑 群
	黄 浩	黄桂清	蒋述卓
主 编	刘焕彬		
副主编	陈建新	谭元亨 (执行)	
编 委	邓开颂	司徒尚纪	李兰浩
	陈剑晖	罗尚贤	金 岱
	黄伟宗	黄启臣	

第二辑序言

在客家精神的星空中

历史的巨浪，淘尽了千古风流人物，却留下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姓名——这已非时光所能带走了的。在人类精神的星空中，一代又一代，都能读出那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的名字。可以说，没有这些星辰的照耀，人类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……而在这众多的星辰之中，有那么一簇耀眼的星星，则是属于客家民系的——当然，它也是属于中华民族这么个星谱中的。

是的，我们曾称过，客家人，是一个精神的民系，一个“形而上”的民系。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精神史上，它占有太多的光亮。精神总是在苦难中迸发、升华的，客家人的千年迁徙、万里长旋，正是这样一抔滋生精神的土壤。

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，才成长出在精神史上彪炳炳赫的一大批历史名人。他们不仅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业绩，也以其伟岸的形象光照千秋；他们的传奇式的生涯代代传诵，他们的人格魅力更永成楷模，并不因岁月的冲刷、风雨的剥蚀而消减或迷失。

他们始终矗立在我们的身边！

一个时代总会造就属于它的巨人。

一个伟大民族总会产生它引以为骄傲的洪钟大吕式的人物。

近现代，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，一大批叱咤风云、彪形炳赫的英雄人物，力挽狂澜，开创了我们民族的新纪元。其间，更有客家名人的熠熠身影。

客家人在近现代涌现出相当多闻名遐迩的历史人物，遍及政治、军事、文化各个领域，几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。

因此，要从精神史着手，研究这么个民系，首先，便会触及占据这个民系精神史上的一系列历史人物——这些人物，烘托起客家精神史的星空，他们便是锻造客家精神的先驱者、牺牲者。离开他们，一部客家精神史便无从说起。他们是历史之子，他们更是历史精神之子。一部历史可以被人说长道短，可历史滋养出来的精神，却是不可以被否定的。

这部丛书，从第一辑开始，便开宗明义，致力于客家精神史的发掘，现在是第二辑，亦不想有改初衷。

于是，我们便从缀连这部精神史的历史人物的研究深入下去。

这无疑是一条思路。

当然，还可以有更多的思路。

而这条思路，则肇始于这样一个历史的叩问：

为何自宋、明以来，尤其是近现代，客家名人出现的密度愈来愈大，及至 20 世纪，可以说，发生了客家“名人爆炸”——从现代思维科学新成果之一——“群体激发效应”来解释，可否就能完全解释得通？“群体激发效应”，当是指某个领域、某个学科中的相互激励，而客家的“名人爆炸”效应，几乎是遍及各个方面。

于是，这也就成为了“客家名人爆炸”的历史之谜。

而要破译这么个历史之谜，光研究单个或几个人物是远远不够的，光研究某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，也同样是远远不够的。

在第一辑中，已经涉及了文学家、诗人、历史学家、艺术家种种。在第二辑中，则专门选取不同历史阶段的杰出人物，包括19世纪与20世纪的政治家与军事家，等等。当然，很多客家历史名人，已经各自有了传记，包括朱德、叶剑英，还有郭沫若、陈寅恪，以及李光耀等。我们曾写过诸如饶彰风的大小不同的传记。

而选取这三位（刘光第、曾生、邓演达），则各有代表性。

康梁的百日维新，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最为悲壮的历史事件。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在菜市口喋血的六君子，无疑是用其鲜血去昭示新世纪的曙光。六君子中，自然也少不了客家人，可惜过去人们了解得并不多，因此，特地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丘铸昌来写“六君子”中的客家人刘光第，当是填补客家精神史上这一段空白，自有深意。丘教授治学严谨，此书历时近十年，及至完稿前夕竟得重病，殊为不易。在此祈愿丘教授能早日康复，日后为客家学多出新著。

客家人也是最早拓殖南洋的，在东南亚，“客人开埠”的美名广为传扬。然而，纵然远离故土，他们的一颗心，仍系在祖国的兴盛上。一旦外族入侵，他们便重返故里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血与火的战斗之中。且不说辛亥革命中壮烈捐躯的归侨里有多少客家弟子，就是在抗日战争中，从南洋、从港澳回来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华侨华人子弟，亦数不胜数。在华南，更有一位南洋学子，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斗争中，成为了让日寇闻风丧胆的名将——他，便是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，“生哥”、“曾大哥”！写这么一位历史人物，又多少可以弥补一下客家名人传记中尚无归侨将军这一缺憾，更何况，东江纵队的老战士及后人，如今仍遍布华南，遍布全世界呢？这也算是奉献给他们的一份心意。

被孙中山称为“两达”之一的邓演达，早期是孙先生麾下的一名骁将，后来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，北伐时，更是第二号人物

——北伐军政治部主任，并一度是武汉政府的中坚。他视死如归，奋而反抗蒋介石的独裁统治，柳亚子挽诗中“太息乾坤剩几头”，正是赞赏他的独立人格与独立思考。从他的身上，我们可以反思到很多、很多……

三部传记，出自不同人之手，自是不拘一格，或重考证与学术，或重文笔与哲思，或重激情与诗意，读者当各有所得，各有所好。所以，不强求一律。

掩卷之余，仍沉入文前提出的历史之谜的思索中。

这三个人物，三位英雄人物，三位历史人物，当在客家精神史上揭示出什么，以解开客家“名人爆炸”之谜呢？

无疑，他们都出在客家“名人爆炸”的19世纪与20世纪这样的历史时代。

他们也同样为民族的危亡，为国家的安危，挺身而出，义无反顾，甚至壮烈捐躯……

他们身上，也同样具有客家人的人格魅力——特立卓行、高瞻远瞩、舍身取义……

他们，也同样重文化、重教育、重孝悌、重勤奋、重节俭、重然诺、重情义……

他们，热情如火、坚韧如钢，始终有一种人所称道的“天放的精神”……

他们坚忍，他们吃苦耐劳，他们能承受人世间的任何苦难，百折不挠……

……

一口气，还可以写下很多、很多——对于这个民系，对于这些历史人物，任何赞誉都不为过。

然而，仅仅是赞誉，也还是不够的，当在这一切的背后，深掘出何以产生这一切的因由来。

这正是这三部人物传记的“形而上”的任务。

时势造英雄，英雄造时势——这只是一般地解释了英雄产生的大背景。没有人民，没有历史使然，是不可能英雄。但是，为何这两个世纪，那么多的历史人物都出在这样一个蛰伏千年的民系上？这却不是上面几句话或某种理论所能解释清楚的。

斯人已矣，来者相继。跋涉过历史的崇山峻岭，后来者可有先行者的坚忍不拔、光彩照人么？

正是为了未来，为了后来者，我们才给自己提出了这么个艰巨的、艰辛也是艰深的任务。我们不知是否能完成。

但我们在努力。

客家名人“爆炸”之谜，当首先从这个民系的大汉民族意识上破译。

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初期的口号“斩尽清妖”，还是辛亥革命中最早的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的誓词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”，无疑都反映出客家人强烈的汉民族意识，这是不可以苛求于历史的。事实上，孙中山等一批有远见的革命领袖，也在后来逐步摒弃了“种姓革命”的口号，强调“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”。尤其是革命成功后，更不见有对前朝政府的统治民族有什么歧视或打击。

但是，作为客家人的脱颖而出，无论如何，还是与汉民族意识分不开的。

远的，元兵南下，文天祥在客家地区组织顽强的抵抗，其惨烈程度，远远超过中原一带；近的，明亡之际，清兵入关，可谓长驱直入，一直扫荡江南，可以说，在中原遭遇的抵抗，远远不及东南沿海。著名的民族英雄、客家人郭维经，在清军大举入赣之际，他率南明军同清军大战于赣州—南安一线，八千部属，血战赣州城下。最后城破，无一投降，郭维经也在嵯峨寺自焚身亡。

清兵入广东，其反抗也是空前的。及至今日，粤东仍有“拜

太阳”的习俗，日子是三月十九日，即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死命的日子——这显然是为汉王朝而祈祷，一直延续下来，作为一种无声的感召！

为何元兵、清军，均在客属地遭到殊死的反抗呢？

客家人，从来以中原古汉族的身份自矜，中土乃是他们古老的家园，纵然千年迁徙，万里长旋，到了东南沿海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却不忘自己是整个华夏古国的主人。虽名为客，可身与心，却永远以主人自居。更何况汉族是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最早的主人，更是这片土地上文明的创始人，所以，他们始终有着中原的忧国伤时之叹、慷慨悲歌之勇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每每北望中原，拔剑击筑，龙吟虎啸不已。

而古老的汉民族文化，更强化了他们的忧患意识。毕竟，中原是孔子所称的“杀伐之地”，由于地理自然环境的严酷，这个民族与生俱来与忧患相伴，危机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其精英之士。而几千年灿烂的文明、厚重的文化，本就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，值得一代又一代人去捍卫它、保存它并丰富它，作为汉民族的一支民系，客家人能不为光复昔日的伟业而奋起么？

他们背负的历史太光荣也太沉重了！

无论汉民族文化到了宋明二朝，已经怎样老气横秋，甚至成了自我虐杀，遭到汉民族中有识之士如李贽、黄宗羲、戴震、龚自珍等尖锐的批判，但正是这种批判，更意味着汉文化所具有的更新、再创能力。而这，比落后、蒙昧的游牧部族的文化，毕竟要有底蕴、有生气也厚重得多。一个古老的文明，当穿越“死亡之门”，来个凤凰涅槃——重任在肩呀！

这便是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一个谜底。汉民族历史文化自觉的负载者，在这民族危亡之际，焉得不揭竿而起，一举冲天？

而千年迁徙，万里长旋，客家人自身的一部流亡史，本身也在滋养着忧患意识，以及更大的危机感。

对流亡者而言，最大的学校不是别的什么，而是自身曾有过的失败。失败，是最好的学校。当欧洲从蒙昧的中世纪走出来，“文艺复兴”中回头去学习古希腊罗马的传统，不正是从其败灭中汲取到无尽的营养么？而客家人被迫远别中原，几乎亡国亡种的遗恨，不一般教他们从中得到无尽的教益么？

历史总是这么写的，胜利者每每目空一切，固步自封，从而不思进取，反胜为败；而失败者总是能卧薪尝胆，汲取教训，从而发愤图强，转败为胜——他们从失败中得到的，比在胜利中得到的更多，“挨了打之后，懂得了学好”——这是人之常情。

正因为迁徙、流离，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客家人蒙受失败的耻辱，所以，作为这个群体的领袖人物，其危机感与忧患意识就比一般人更为严重。有危机感，方会敏锐、独具慧眼；有忧患意识，方能时刻警醒，引前车为鉴——而这些，则是客家名人脱颖而出的根本要素，同时，也形成了他们巨大的人格力量，并由此产生号召力，以在危难关头，把握住历史之舵，穿越“死亡之门”！这正是流亡者成功的秘诀，天生的秘诀，也是他们智慧与力量的宝库。试想一下，犹太人之所以成功，不也是因为这个么？是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感、“沉船意识”，激活了他们的生存智慧，他们才如此及时地抓住一个又一个成功的机会，无论是经商，还是科学研究，抑或政治角斗……

流亡者，不在沉沦中奋起，便在沉沦中寂灭，多少流亡的民族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没，销声匿迹，有的，只能在考古中才被重新发现，可大多数，就永远不为人所知，堕入冥冥深处，可独余下犹太人。在东方，更余下了客家人，注定要为人类的辉煌而燃起更旺的文明圣火！

我以为，这当是破译客家名人爆炸之谜的第二个谜底：作为流亡者的特有的历史身份而激发出的潜质。

在破译第三个谜底之前，我想回顾一段历史。

纵然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内讧失败，并被某些人诟病得无以复加，但是，无论怎么说，它绝不是过去周期性的农民起义的重复，它已注入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因素——这也是客家人敏锐之处！

不说《天朝田亩制度》中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先进因素，只说太平天国对西方列强所表现出的民族自尊——这与当时的满清官员卑躬屈膝成了鲜明的对照：

就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，取得初期胜利之际，英、法、美三国公使自然嗅到了什么，赶紧在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与四年（1854年）先后造访天京。当时，英国公使文瀚想讨好太平军，声称，英国“绝对保守中立，不助满人”。可其得到的却是“充满自信心之冷静态度”的回答：“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。但即令助之，也是无用的。”

当文瀚将《南京条约》中文本“赠送一份”给太平军，以使太平军“各首领明了英政府与现时中国政府订有条约及该成约之详约条款”，妄想让太平天国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时，还附信以威胁，说如不承认，“英国必采取与10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，施以抵拒”。

但太平天国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，对此不予理睬，以致美国公使麦莲在向其国务院打的报告中肯定地说，若要“天王兄弟及其臣下”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，“是极不可能的”。

1860年，太平军解放苏州，太平天国后期的主帅洪仁玕，这位意欲利用太平天国实行一系列政治、经济制度变革的先行者，写信给在上海的英、法、美等国公使与领事，敦促他们恪守曾经宣布过的“中立”，切勿食言“助妖”，他们便立即撕下了中立伪装，扬言“武装保卫上海”，组织洋枪队顽抗，终被打个落花流水。后来，1861年冬，几艘美国军舰驶到天京，司令何伯、参赞巴夏礼，一同去见了洪秀全，称，只要接受同英国平分中国

土地的条件，太平天国就能得到他们的援助，否则，他们便“另行举动”。结果遭到洪秀全痛斥：我起义兵，欲救全国，决不干“引鬼入邦”的卖国勾当。其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尊严及爱国主义立场，何等鲜明！

这段插入，正是证明上边所揭开的两大“谜底”——即强烈的汉民族的自尊意识及作为流亡者滋生的危机感；及时敏锐地察觉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狼子野心。

也许，会有人责备他们在策略上缺乏灵活性，何不如列宁当日忍辱负重，先签订个布列斯特和约，忍痛割让 100 万平方公里领土，付出巨额赔款，以争得和平喘息的时机，最后在有利机会之时，再废除此和约——前后还不到一年。然而，历史是不可以简单地类比的，而当时太平天国对西方列强的认识也不可能太深，但是，强烈的民族自尊却是他们决不可能放弃的——这正是需要我们今天加以理解与认识的！

现在，来谈第三个谜底。

这个谜底，可以从洪仁玕的《资政新编》中找到。

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，在初期聚义失败时逃往香港。四年之后，辗转迂回，历尽艰辛，最后终于到达了天京，临危受命，主持几经内讧已面临败灭的太平天国大政。为了挽狂澜于既倒，他发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巨著《资政新编》。

时至今日，仍有人叹息他“太超前”了。

因为，在这部巨著中，他提出，要“以资为政”，把这作为“立国之本”。一打开书，便有“治国必是立政，而为政必有取资”，这比同时甚至稍后于他的启蒙思想家们的主张“变器不变道”走出更远！

他明确地提出了一系列建立现代社会的构想——兴车马、舟楫之利，兴银行、兴器皿技艺、兴宝藏，开发各类矿产，兴邮产、兴各省新闻官、兴省郡县钱国谷库、兴市镇公司，施行工商

水陆关税之法，兴士民公会……这均是切实可行的政治、文化等建设的具体措施，却又颇具战略意义。

这一切，都是他精心研究当时西方的先进政制之后所制订的。

在总旨上，他提出了“工商皆本”的命题，允许“富民”从事工商业经营与矿业开发，从事近代的金融业，从而达到“与番人并雄”、“奋为中地倡”的目的。

他坚决反对外国侵略，维护民族尊严，同时，也不赞同中国传统的夷夏观，“凡外国人技艺精巧，国法宏深，宜先许其通商”。

他远远超出后来洋务派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力主学习西方的立法制度，否则，不足以改造一个积弱落后的中国。他认识到：“用人不当，适足以坏法；设法不当，适足以害人。”对几千年君权神授的“人治”，对封建极权专制，对礼法名教、旧仪习俗，也统统予以挑战，要建立全新的人文观念。

中国第一位留学生、启蒙主义者容闳，当年亦寄望于太平天国，并亲自上天京考察，他是这么说的：

“天假此役（即太平天国），使全国人民，皆从梦中警觉。”

关于洪仁玕的政纲，还可以作更多的研究分析，洪仁玕自己也早已说了：

此皆为邦大略，小弟于此类，凡涉“时势”二字，
极深思索。

他没有在香港白呆几年——正是这几年中，他在已被英国强行割走的香港，对当时先进的西方政制，下了很大的功夫钻研，颇有心得，《资政新编》绝非凭空而来。

及至以“洪秀全第二”自称的孙中山，也毫不讳言，宣称他的革命思想是来自于香港的。

对《资政新编》的进步意义，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。可惜，洪仁玕抵达天京时，已经太晚了，无法实施他的宏图大略，尤其是清王朝与帝国主义侵略者联手，把太平天国置于血泊之中。

千古遗恨！

否则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，当提早很多——当年，清兵入关，仅在江南一带便杀了 3000 万人，比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屠杀 2000 万印第安人还甚。而更令人扼腕的是，中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，尤其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扬——本来，如黄宗羲等一批思想家们，早在明末便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，有力地批判了君主制，君“为天下之害”，提出“工商皆本”的先进经济思想，以及设“学校”——即议会议政等一系列措施。

直到 200 年后，维新派起而反对封建专制，作为主帅之一的梁启超还说：

我们当学生时代，《明夷待访录》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。我自己的政治活动，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。

所以，以汉民族意识为重心的南方这几次革命的历史动因，正是客家人在近代崛起的深层沉积所形成的。

而客家人抵达南方，较早与西方的先进文化发生接触，力求尽快摆脱中国落后积弱的状况——这，在洪仁玕、孙中山身上，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。同样，在这一辑的三位历史人物身上，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。

应该说，这便是第三个谜底：客家人较早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，有敏锐的历史眼光以及再创辉煌的宏图大略。

当然，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，也较早接受了启蒙思想及西方的先进文化，可他们当中，虽然不乏锐意创新者，包括飞行之父

冯如、铁路之父詹天佑，以及众多的大商人、大实业家，可是，从名人构成的成分，以及数量，却怎么也不如客家人，这又是怎样的一个谜呢？

应该说，在这点上，客家人仍带有北方士族的忧患意识，尤其是慷慨悲歌的义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所以，他们当中，出大军事家、大政治家、大文学家比大商人、大实业家要多。而后者，由于缺少“北人”的忧患意识与重义轻利的观念，所以涉足的领域便大相迥异了。

谜底到此，也许已可知十之八九了。

首先，是汉民族意识；

而后，是流亡中激发的自强不息精神；

尤其是来到东南沿海之后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敏锐。

然而，如果光有汉民族忧患意识、慷慨悲歌的义气，而没有与先进文化的接触，那么，也就会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或狭隘的民族主义，是出不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历史人物，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，更成不了叱咤风云的领袖或名人的，不可能顺应时代的大潮——关于这一点，近代史上已有了不少悲剧的证明，包括义和团等震动一时的反抗。

同样，如果只有对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的敏感，而没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、慨当以慷的义气，那么，也很难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形成气候，毕竟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不可能似西方那样迅速崛起，并且主动地去争取到说话的权利，所以，即便在广东，不少商人到头来也不得不“捐官”，而即使戴了个红顶花翎，还是低官一等。为何东南沿海的其他民系，在其他领域也有若干领先的人物，但在整体上，尤其是团结、组织革命力量上，却远不如客家人那么有凝聚力。换句话说，光有敏感而无义的凝聚，同样是难以成气候的。

所以，二者不可或缺，缺一，则难以成就近代中国的伟业！